

任彦芳·著

新史學

叢書

焦裕禄身后

——我与兰考的悲喜剧



广东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焦裕禄身后：我与兰考的悲喜剧/任彦芳著. —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9. 1

(新史学丛书系列)

ISBN 978-7-218-06088-0

I. 焦… II. 任… III. 兰考县—地方史—史料 IV. K296.1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202958 号

选题策划	余小华 肖风华
责任编辑	肖风华
封面设计	方 雷
责任技编	周 杰 黎碧霞
出版发行	广东人民出版社
印 刷	佛山市浩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 张	17.25
插 页	2
字 数	280 千
版 次	2009 年 1 月第 1 版 200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18-06088-0
定 价	38.00 元

如果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出版社（020-83795749）联系调换。

【出版社网址：<http://www.gdpph.com> 电子邮箱：sales@gdpph.com

图书营销中心：020-37579604 37579695】

因书中所选某些图片联系不上作者，请作者与出版社联系。

总序

读者看到“新史学”三字，也许会联想到20世纪初梁启超发动的那场史学革命。其实我们并没有梁启超那样的雄心，我们所遇到的问题和困惑，也和他那时大不相同了。昔日梁启超们痛感旧史等同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因专供特殊阶级诵读，故目的偏重政治，而政治又偏重中枢，遂致吾侪所认为极重要之史迹有时反阙而不载”，所以他主张要写“新史学”。今天，大概已经很少有人以为历史只与帝王将相有关了吧？这也是梁启超们努力的结果。

我非史学界中人，但雅好读史，对史学研究的现状，觉得有这样几个毛病：一是对待史料，常凭个人好恶和口味而取舍。为了证明自己观点的正确，每置大量“不利”的史料于不顾，却把孤证当宝贝津津乐道；二是回避真问题。1949年以来，连篇累牍讨论的关于奴隶制和封建制分期、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关于农民起义性质等等问题，几乎都成了毫无意义的废话。反之，对日本侵华战争烧杀抢掠、无恶不作的罪行，却很少写成历史。到了和日本右翼较量时，历史学给我们准备的证词却是令人沮丧的单薄，拿不出扎实的具有专业水准的实证研究。三是忽略了宏大背景中小人物真实的生活和真切的情感。就像前辈史学家所说，哪一年发生了什么战争，哪一年哪个大臣受到了什么赏赐，史籍上都清清楚楚，而当时老百姓用什么餐具吃饭，婚娶的风俗是什么样的，寻绎却十分困难。在近现代史研究中，这个毛病更为凸显，小人物的史迹越来越被一个个宏大的浪潮所淹没。至于为时风所侵袭，或躲躲闪闪，不敢直面历史，或哗众取宠，制造“史学泡沫”，或急功近利，专以“戏说”为事，就更是等而下之的通病了。

我们希望这套丛书不同于象牙塔里的高头讲章，要让普通读者有阅读的兴味；要讨论一些真问题，虽不必让所有读者都同意你的看法和说法，但至少要引发他们的思考；当然，更不能打着史学的旗号，兜售私货。要做到这些，我得承认，我的学养是不够的，但心是虔诚的，算是“虽不能至，心向往之”吧。由于个人的兴趣，我更喜欢那些以史料说话的书，因为任何理论都是灰色的，都可能过时，而以扎实史料说话的书，即便“结论”过时了，但史料也许还会活着——尽管它也必然会带有一定的主观性，而且不能不受记录人思想感情、方法手段的影响。还有，我是本丛书的策划人，它不可避免地会受到我个人喜好的影响，这些都是要向读者说明的。

钱潮汹涌，书斋寂寞。当下，有真学问的史家也许不少，可要在现有条件下，推出一套适合普通读者阅读、对当下一些真问题有所回应的史学书却并不容易。组来的书稿，本来有十余部，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有的只能暂且搁置。恰好手头另有一套文史丛书，和这个选题互有交叉，于是将二者合而为一，这套书也就成了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史学丛书，而是一套比较开放的丛书——无论何种写法，无论何种体裁，只要有新的材料，或是有新的见识，都拿了进来。鲁滨孙说：“就广义说起来，所有人类自出世以来所想的，或所做的成绩同痕迹，都包括在历史里面。大则可以追述古代民族的兴亡，小则可以描写个人的性情同动作。”据此，说这套“新史学文丛”所反映的是广义的历史，也应该是可以的吧？

几年前编“文史年选”，我在那篇短序里说过：“绝对真实的历史是永远无法获得的。《联共（布）党史》曾被我们奉为圣典，当斯大林走下神坛之后，才知道那并非历史的真实。有人说‘那是用血写成的谎言’，这话确否暂且不论，但它确实只能算是布尔什维克‘斯大林派’的历史。要是站在托洛茨基的立场上看，那当然全是颠倒黑白的。”也许可以这样说，任何历史都是片面的。关键是：我们要学会从片面中感知全面，对历史保持一种温情和敬意，并且要有个基本的底线，即使不能全说真话，但决不说没有根据的假话。

向继东

2008年10月于长沙

引 子 焦裕禄老领导的期望 焦裕禄继任者的遗愿

1960年，中国最困难的年月，为了支援农业，我继父从信阳铁路工委书记调任兰考县委副书记，1962年，母亲从信阳铁路公社副社长的位上离开，为了与丈夫同甘共苦，也到了兰考；1962年10月，我去兰考看望母亲，不久，焦裕禄调来兰考，与我家做了邻居；1963年冬，我再次来兰考，便与老焦有了多次交谈，逐渐熟悉起来，这年春节前，他回山东老家看望母亲，我送他们全家出了兰考县委的大门，没想到这竟是我与焦裕禄的最后一次见面！

1964年5月14日，焦裕禄永远地离开了他热爱的兰考。母亲因为这位真正共产党人的离去，精神受到了大的刺激，住进了开封医院。我来探望母亲，她含泪向我讲了老焦动人的事迹。我向长影党委写信，要求在这里生活，写焦裕禄的电影剧本，但当时未得到批准；回到长影后，多次向同志们讲焦裕禄的事迹；1965年2月，终于得到长影党委的批准，让我来兰考生活，组织电影剧本《焦裕禄》的三结合创作组；焦裕禄去世后，兰考由县委副书记、县长张钦礼主持工作，我和张钦礼在一起下乡挖过台田，多次和他交心谈话，半年之后，地委派周化民来兰考任县委书记，接焦裕禄的班，成为焦裕禄身后的第一位继任者；1965年8月，根据地委安排，我们创作组全体成员参加了兰考的“四清”运动，我和周化民在兰考城关公社胡集村蹲点。4个月后，新华通讯社记者来兰考，写出了著名的大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震动了全国；这之后，我便调出工作队，参加了由文化部领导

的电影《焦裕禄》创作组。1966年2月，我有感于多年来对焦裕禄的感情，完成了长诗《焦裕禄之歌》。这年3月，我们全体创作人员正深入生活构思剧本时，接到上级令，回到北京，按着《林彪委托江青在部队文艺座谈会纪要》精神总结，剧本令人痛心夭折了！而后不久，创作组的人员回各单位参加“文化大革命”，兰考在这种背景下，发生了谁也意想不到的悲剧！

我的命运便自然地与兰考不可分开。我关注着兰考，关注着兰考百姓，关注着我相识的同志的命运，这是与我命运相连的命运。

1966年3月，兰考“四清”工作队支部通过了我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申请，实现了我从少年参加革命时的愿望。我的入党志愿书上报“四清”分团党委后，党委讨论批准了。我本来想回到长影，我的组织关系会立即转到长影的；没有想到由于兰考提前开始的“文化大革命”，“四清”分团的档案在动乱中失去，我便没有成为共产党员。

1967年，我回到兰考，看望我关心的朋友们。没有想到，这次到兰考来，却给我带来了灾难；我在开封和兰考的言论被转到了我所在的长影，成了这场悲剧的导火索，我开始被掌权的造反派关起来，于是有了近5年的审查。

1978年，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得到彻底平反，组织退回了我交代的材料，共有约60万字，而《我和兰考的交代》就有近20万字。

1980年，我由兰考县委和开封地委借调到兰考来，本着中央实事求是的精神，纠正在宣传焦裕禄中的一些失实问题。我在兰考生活了3个月，对兰考的历史有了进一步的了解。更令人高兴的是兰考发生了巨变，兰考百姓把多年的讨饭棍扔掉了。不少老同志都希望我把兰考的这段历史写出来，我便决定写一部长篇纪实。作为兰考历史的见证人，我有责任完成老同志们的愿望。

这之后，我每年都去兰考，而这种呼声却越来越强烈。

经过几年的努力，我终于在2000年完成了全书。

我把书打印出来，发给所有知情的老同志，听取意见。然而，这部书却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出版社。而一些当事人却因年龄和身体状态，要求出版的希望更加迫切起来。

没有想到，2006年6月，我书中所写的主要人物之一，焦裕禄身后的继任者周化民没有见到这部书的出版，便永远离开了！

周化民真正是焦裕禄的战友，他们曾在一个单位工作，青年时代，焦还曾给周化民介绍过女朋友，可见亲密。但在“文革”中周化民却被打成“反对焦裕禄的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在兰考各村批斗，打折了肋骨，鲜血洒遍了兰考各个村落；当年的《人民日报》竟点了周化民的名字定成走资派，这是全国3000个县委走资派里惟一被中央大报点名的。周化民在兰考隔离时，我去兰考，竟不识时务去看望了这个曾和我一



周化民

个村搞过“四清”、一起在贫农的家里“四同”的县委书记。我只说了一句话：相信群众相信党吧！我内心的意思是你是打不倒的。这样，我也就被兰考某些人揭发，把材料寄到了我当时所在的长春电影制片厂，由此做导火线，让我交代“反对焦裕禄支持走资派的罪行”，从此我也同样走向灾难的深渊；长影的造反派到了兰考，让周化民交代我的问题，也由于他的实事求是而挨了长影外调造反派的毒打。这些血的记录现在虽不能面世，却永不会让人遗忘。

我与化民同志因命运相系，所以成为无话不谈的知心朋友，他是最尊敬的兄长，是我母亲称为真正共产党员的好同志。去年，母亲病重，他拖着带病之身，拄着拐杖也到医院去探望；母亲去世，他亲自去参加遗体告别仪式，这是我与他最后的一次见面。只要有会回开封，我第一个要看望的是化民，他那里是我的家。如今，我的开封最亲近的人走了。我有多少话要说？我记得上次离别时，他最后说的话是：“我和张申同志和许多老同志都盼望你写的《谎言的悲剧》出版呀。晚了，我们就看不到了。香港凤凰卫视总算把兰考真相说出了一点，也算是一点安慰吧。”

化民同志一直关心着我写的《谎言的悲剧》，然而，他匆忙离开了这个世界，没能见到它的出版，这是我的心结。在我写这篇怀念化民的小文时，我又反复看着他写给我的一封信，这是他看了那部书稿后写出来的意见，也是这位老共产党员的追求和信念：

我们共产党人是信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确认马克思列宁主义就是真理。所谓真理，就是对客观事物的正确反映。因此，我们在一直追求真理，并为之奋斗终生。真理的前提是实事求是，既不扩大，也不缩小，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非常真实，真诚，不能有半点虚伪和伪象，更不能“见利而忘真”。这是我们共产党人对待

和处理事物的唯一标准，也是我们党一贯提倡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正确思想路线。

根据这一原则，我认为任彦芳同志所写的《谎言的悲剧》一书，是符合这一原则的。作者通过长期的多次的向有关同志直接采访，询问，了解每件事的来龙去脉，以及具体经过，



作者与周化民

同时又通过各方面的调查了解，去核对与证实每件事情的真情原委，用大量的生动事实来揭穿和批驳那些莫须有的谎言及其产生的恶果，使人分清是非，明辨真伪，看后深受启发。其中涉及到我的某些问题，我认为都是实事求是的，能够经得起时间和历史的考验的真实情况。

我对这本书的突出印象是真实感较强。为此，建议能够快些出版为宜，与读者早些见面。这对于更好地贯彻执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以及“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精髓——实事求是这一重要原则，推动当前全面小康社会的建设，必将起到积极的作用。

这里我要提到的是，我是在焦裕禄同志逝世后，调到兰考县任县委书记的。在“文革”中受到了所谓“焦裕禄的亲密战友”迫害，制造了很多谎言，罗列很多罪名，并登在当时整版的《人民日报》上，后被定为死不悔改的走资派。粉碎“四人帮”后，经中央批准，由河南省委为我平反，并将平反文件发到全省县以上单位。

周化民 2004.1.6

我没有想到，这封给我的信，竟成了他最后的遗愿。

就在同一天，我又接到了当时与焦裕禄一同在兰考工作的老人刘呈明写给我的对这部书的意见：

焦裕禄同志在兰考县任县委书记时，我任县委副书记。我们相处很好。

我看了任彦芳同志写的《谎言的悲剧》一书原稿，觉得很好。首先是书的名字，谎言一定要产生悲剧，这是从古至今存在一个普遍问题。谎言不是事实，就不是实

事求是。实事求是才是我党的正确路线。过去我们这方面的教训太多了，也造成了不可挽救的悲剧。

作者通过长时间调查了解写成的这本书，我认为是实事求是的。说起谎言，在“文革”中的兰考县说得太多了，甚至说到党的领导人身上。所谓“焦裕禄的亲密



刘呈明

战友”，是个天大的谎言，焦裕禄同志如在天有灵的话，他是不会承认他这个“亲密战友”的。在这个问题上我可以说出很多证据，那是封的假亲密战友。还有谁要是反对所谓的亲密战友，就是反对焦裕禄，就是反对毛主席；把他和焦裕禄、毛主席划成等号。因此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结果一个小小的兰考县在“文革”中打死致死一百多人，致残打伤上千人……全县的生产和群众遭到的损失和破坏更一言难尽。这就是所谓亲密战友的所作所为，也就是说谎言造成的悲剧。

我希望这本书早些出版，以便澄清是非，明辨真假凝聚人心，加强团结，更好的在党的领导下，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而努力奋斗。

刘呈明 2004.1.6

一直是焦裕禄的老领导老上级的张申同志，现在已88岁高龄，直到今天，只要有朋友去看望他，他便问我写出的这部书何时出版；我知道，他是期望，能够早日看到这部书，这是老人的一件心事。

张申同志看了我写的这部书，最早给我写了一封信，写出了他的愿望和期待。

彦芳同志：

你好。托转孙玉尊同志的书已送到。他已给你去信，想该收到了。

《谎言的悲剧》书稿早已看过，是一本好书，望早日出版。书中所写的人物和事都是真实的。当时（1952年冬——1969年秋）我是中共开封地委书记，书中人和事我都亲身经历过。在那种蔚然成风的大气候中我也是谎言的制造者、传播者。但当悲剧初现时，曾因直言而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反右”后，谎言风愈刮愈烈，悲剧也愈演愈大愈深。痛定当思痛，以警后人。目前，某些当权者制造的谎言还少

吗？悲剧也常见报端。悲剧来自谎言，谎言导出悲剧。谎言出悲剧的教训是深刻的。迅速出版该书的现实意义就在于重锤敲警钟，勇于面对历史，敢于宣传真知，历史不可忘记，历史不可重复。幸甚。

新年即到，祝新年好及全家康乐。

张申 2003.12.26

2003年12月，我写兰考的又一部长篇纪实《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从兰考看中国》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后，我去河南看望老同志，他们看到这本写焦裕禄身后第九任县委书记朱恒宽同志事迹的书，自然非常高兴，为焦裕禄精神在兰考的发扬而欣慰；同时，他们便关心起那早写出来的这部记录历史的书的出版。因为他们是这历史的见证人，如果他们不在，怕有些事情后人说不清楚，留下历史的遗憾。



2008年4月25日，作者看望张申

张申的信里所说，我送的书便是那部写兰考现实的长篇。我没有见到当年在开封任专员的孙玉尊同志，便请张申把书转给他。

回到北京，便收到了孙玉尊同志的来信。

任彦芳同志：

你好。

昨日（12月19日）上午我在家中等你来访，因我临时有事外出未能在电话中和你交谈，请原谅。今天下午（12月20日）张申同志将你赠我的书送来，我非常感谢你。另外还有一事就是前几年你写的那本《谎言的悲剧》一书，为什么到现在还未出版？此书初稿我看过，我认为这本书写的真实客观，非常实事求是，对人的教育意义是很大的，我希望该书能很快出版与广大读者见面才好。你看如何？希望你今后能经常来河南。再来郑州时，欢迎到我家做客可好。

此致

敬礼！

孙玉尊 2003年12月20日

那几年，我是经常回河南的，每年的五月十四日，是焦裕禄逝世的纪念日，我便去兰考参加纪念活动。200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这一年六月，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了我写焦裕禄的长诗《党魂——焦裕禄之歌》，为向兰考党组织汇报，我来到县委，这时听到广大



作者与刁文

群众和干部反映，说现任的书记是个实事求是的书记；于是我留了下来，在兰考深入生活半年，写出了一部反映兰考现实的长篇纪实。

写出这部书后，我便去了美国，一年后回来，那部写历史的书没有结果，这部写现实的书，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这部书名为《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从兰考看中国》。

2004年5月14日，是焦裕禄逝世四十周年，兰考县委隆重纪念，我应邀参加。见到了焦裕禄身后的几任书记，有我书中写过的周化民，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兰考转折时期任县委书记的刁文同志。他们都关心地问这部写历史真相的书何时能够出来，我无法回答兰考的同志和百姓。

历史在沉思，我们拒绝遗忘。一个忘记历史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民族。不敢面对历史，是虚弱的表现；现实是历史的继续。

就在这纪念焦裕禄的时候，我听到一个让我震惊的消息，曾被称为“焦裕禄亲密战友”的张钦礼在五月七日，即焦裕禄逝世纪念日的前一周离开了人间。

历史到这时，应该有一个总结了。时间过滤了个人恩怨后，看历史会更加客观。

当事人在一一离去，当事人是历史的见证者，如果不在他们还健在时，记录下他们经历的真实，必会留下历史的遗憾。

今天终于可以回答老前辈的期望，终于可以告慰走了的老同志们了。

第一章 凤凰大视野：寻找英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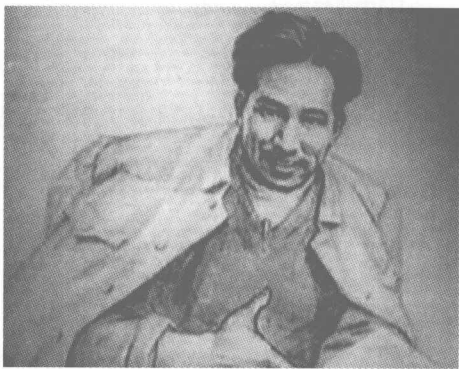
2006年6月10日，香港凤凰卫视台的记者来找我，他们是为寻找英雄，为了解焦裕禄而来。他们看过我写的长诗，最近又看到我在国际网上发表的关于焦裕禄及身后继任者命运的文章，便决定来采访我。

没有采访提纲，让我说我想说的话，海阔天空，没任何限制；说办就办，找个地方，支起了机器，对好灯光，我便打开了历史的闸门，让回顾的流水顺流而下。我们谈了近5个小时，临行前，让我和焦裕禄的继任者周化民通了话，他们立即去河南省。

1个月后，2006年7月15日晚，我从凤凰大视野里，又看到了我的老朋友，我的前辈张申同志，看到了周化民同志，也看到了焦裕禄的大女儿焦守凤，大儿子焦国庆，看到了老朋友、相识四十多年的兰考县委原宣传部副部长刘俊生。

记者把我们的谈话剪接成一个集体交谈。

这之后，我便接到了很多海内外朋友的电话，说他们在香港凤凰卫视上看到了我，更有不少朋友向我提出，说谈得太简单，还似乎没有说透，他们希望能把这段历史写出来。我回答说，我早就写出来了，但愿你们能够看到这部书。我说，这香港



焦裕禄画像

凤凰大视野的剪接采访，算是我写的书的提要吧。

—

主持人：1966年2月7日，一篇由穆青、冯健、周原三人撰写的题为《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的通讯，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播送。有人说这篇通讯无异于在兰考上空爆炸了一颗精神原子弹。（画面：电影《焦裕禄》中的镜头）



1962年的焦裕禄

这是电影《焦裕禄》中的一个情节，是焦裕禄初到兰考，在火车站看到的灾民逃荒的景象。

这是1962年的焦裕禄。这一年的冬天，受开封地委委托，从尉氏县调任到兰考。前任兰考县委书记王金碧由于生活作风问题被调离；时任开封地委书记的张申提议由焦裕禄来担任兰考县委书记，这一年他四十岁。

任彦芳（作家）：兰考穷，兰考富，兰考出了个焦裕禄。

兰考后来是以焦裕禄出名的，以前是以穷，以讨饭有名。当时的干部为穷发愁，都不愿在这儿。

张申（原开封地委书记）：当时的县委书记也不行，也懦弱；因为他本身在那样困难的情况下，发生了生活作风问题。发现这个情况，我觉得兰考不行，县委书记得换人。把县委书记给换了，换了调谁去呢？当时考虑的是另外调个县委书记，可这个同志不愿去，他怕困难；我就想到焦裕禄了。

任彦芳：找到焦裕禄的时候，焦裕禄二话没说。既然党派我去，这个地方最穷，我希望地委帮助我。我去，努力完成党交给我的任务。

张申：因为对焦裕禄，我知道他。1948年，我在尉氏县当县委书记，他在县委宣传部当干事，以后当团委书记。这个人很能干的。

记者：接到地委通知的焦裕禄，于这一年的十二月来到兰考，不久他把妻子和六个孩子也接了过来。

焦裕禄的长子 焦国庆：我父亲在去兰考之前是尉氏县委书记。我们全家从尉氏到兰考的时候，这一看兰考县城就不一样……

焦裕禄的长女 焦守凤：一下车全都是白茫茫的，就是那盐碱，没有长树；这

里确实是自然环境很差的，都是盐碱地，又连续几年下大雨，淹的淹了，都不长庄稼。

记者：位于黄河故道的兰考，受到盐碱、风沙、内涝三大自然灾害的侵袭，兰考人称为“三害”。

张申：大家为了逃命啊，这就往西跑，扒上火车往外边走，有上西边去的，有上南去的；上西边去的多。所以兰考难民出去逃荒，比较出名了。

任彦芳：当时称为兰考路线。什么叫兰考路线？就是逃荒讨饭的路线。兰考的小车站，给全国的压力挺大。全国铁路都提出来到处都是兰考要饭的，他们都管扒火车叫扒大轮；他们不是坐那客车，而是扒货车；见到货车一来，这些人便蜂拥而上，挤上去；这车拉到哪儿就是哪儿，到那儿便下车讨饭。有的拉到大西北去，到那里去讨饭。

记者：面对粮荒和饥饿，焦裕禄想从外省购粮救急；但是当时粮食属于国家物资，实行统购统销；想到外地购粮，需要冒极大的政治风险。

刘俊生（原兰考县委宣传部干部）：这时候焦裕禄是积极地想办法，在粮食政策许可的情况下，到外地购买了很多代食品，比如萝卜干呀，红薯干呀，这不是属于粮食的叫代食品；当时粮食是不能动的。

记者：在暂时解决了群众的吃饭问题以后，焦裕禄总结了很多近几个县治理风沙的经验，开始在兰考境内大量地栽植泡桐，用来防治风沙。若干年后，那些栽种的泡桐树都已经成材，砍伐后，成了几家乐器厂的上好的木料。唯独这一棵，兰考人却把它留了下来。因为它是当年焦裕禄亲手种下的，兰考人给它起了个名字叫“焦桐”

任彦芳：1957年，兰考的粮食产量是历史的最高水平。1957年以前，兰考是粮丰林茂；泡桐树都起来了。没有内涝，也没有盐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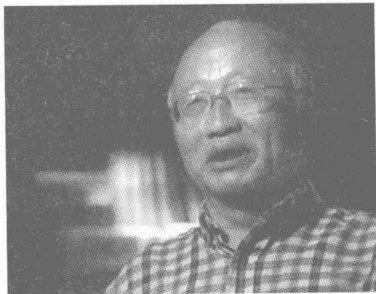


原开封地委书记张申

刘俊生：1958年，那时候号召大炼钢铁。用什么炼哩？就是用树木。有很多树木就是这时候被砍伐了，泡桐统统给砍了！大树小树都砍光了！砍的树，便去炼钢去了。结果是钢也没有炼出来，树木全砍掉了；树没有了，风沙便又起来，再也没有挡风沙的了。兰考的风沙就是这么起来的。

张申：人民公社化了。很多劳动力都调出来了。地里的粮食也没有人收了。那年是丰收啊，花生在地里都没有人拾没人收。吃饭不要钱，所以把粮食糟蹋了。

记者：有人说1958年的大炼钢铁、人民公社和浮夸风也是“三害”。是比自然灾害更厉害的灾难。



作家任彦芳

任彦芳：说谎话说瞎话，说粮食亩产多少万斤；完了以后，便是高报了高征购，都征购上去了，老百姓没有粮食了。

记者：1963年前后，焦裕禄冒险对兰考的经济体制进行了一些变通。

刘俊生：为了使群众的生活比较能有稳定性，固定性，刺激群众生产积极性，所以把当时的一些荒地，把一些边远地承包给社员，让社员来耕种。

任彦芳：他先看到有的村的枣树包给个人了，结果枣落住了；他受到启发，他就采取了林木的几包，搞了承包责任制。

张申：这样逃荒出去的就少了，出去的人也回来了；人们有盼头了。

任彦芳：那时候是谈包色变哪。谁敢说一个包字？那包产到户便是资本主义，那就是立场问题，路线问题；焦裕禄没有回避这个问题。说包下去，出了错我负责。

记者：1963年前后，焦裕禄的肝病数次发作，剧烈的疼痛使他多次倒下；1964年，焦裕禄住进了郑州医学院附属医院；在附属医院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

张申：他去兰考工作的时候有肝炎，那时还没有肝硬化；后来，我知道他肝硬化了，我叫他去医院检查……



焦裕禄长女焦守凤

焦守凤：他去医院时，身体非常虚弱，脸上疙疙瘩瘩的，说话也非常吃力。我去医院看父亲，他就问我：兰考下雨了没有，地淹了没有？我对他说没有。其实我也不知道。我当时在开封。我想，你都病成这样了，你还管兰考干吗呀？

任彦芳：1964年5月14日，焦裕禄与世长辞。我的母亲受到巨大的刺激，也住进了医院。她给我

写信说：一个最好的好人焦裕禄，老焦不在了！

记者：1964年5月14日，焦裕禄因肝癌晚期医治无效，病逝于郑州。终年42岁。

二

记者：这是1966年2月7日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

张申：焦裕禄去世后，我们认为这个同志很好，精神可嘉；当时地委就发出向焦裕禄学习的通知；以后又报到了省里，省里也通知学习焦裕禄。

任彦芳：我来开封探望母亲，听她讲了许多焦裕禄的事，当时非常感动。我就给所在的长春电影制片厂党委写了一封长信，讲焦裕禄的事迹；1965年2月，长影党委派我来兰考搞焦裕禄的电影剧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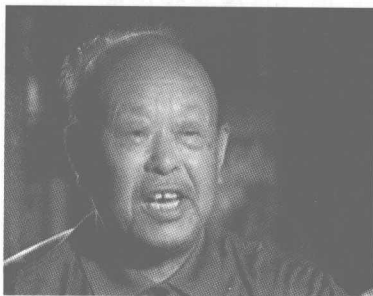
记者：这是1966年2月任彦芳发表的一首长诗《焦裕禄之歌》。

1965年，为了深入兰考生活，任彦芳参加了兰考的“四清”工作队。就是这时候，新华社三位记者来到了兰考。

任彦芳：1965年8月，我参加了兰考县“四清”工作队，和兰考当时的县委书记周化民一起，在他蹲点的城关公社胡集村。搞到12月份，这时才听说新华社来人了，说是要写焦裕禄。

刘俊生：周原先来的，来了他第一个见到我。

任彦芳：当时，他们来豫东，是想写兰考的生产救灾情况；因为兰考是豫东最穷的县。到了兰考，一说生产救灾，必然要说到为了兰考救灾，为了兰考除“三害”而牺牲的，就是说把生命都搭进去的焦裕禄。



原兰考县委宣传干部刘俊生

刘俊生：这时，我就和他们谈，我们这个县，为了除“三害”，把我们的县委书记都累死了。一说到这儿，他问是怎么累死的。我说了焦书记是怎样累死的，是为了除“三害”；他听了说好，我们这次就写这个书记，搞一篇大的报道。

任彦芳：周原、穆青，这些记者都为焦裕禄的事迹非常感动，于是改变了原来的计划，就开

始写焦裕禄的大通讯。据我所知，这个焦裕禄的通讯，是他们采访了4天之后，在开封写的，由周原起草，穆青修改。我知道这消息后，到了县委，见到周原同志，周原说，你们长影抓到了一个很好的题材，你们很有见地呀。

记者：1965年年底，周原在张钦礼等干部的陪同下，在兰考进行了4天的采访；其间，周原从兰考干部和百姓那里，了解到焦裕禄的许多事迹。为了避免一些宣传口径和中央精神相违背，他们挑选从生产救灾的角度对焦裕禄进行描写。然而，在县委举行的大通讯的讨论会上，周原和县委其他同志发生了争吵。

周化民（原兰考县委书记）：县委就开会了，周原就念了。念完这后，让大家提意见。提意见不是嘛。我是县委书记，提意见，别人没说话，我就说我提几条。我说其他情况我不了解。我听了之后，觉得说兰考的面貌改变了，有点过分了。我说还是留点余地好。

任彦芳：在通过稿子的当时，因为是周原自己写的东西，非常偏爱吧，所以人家县委的同志提出任何不同意见，他都一一反驳。有的县委同志说他很粗暴，就是不允许不同意见，所以便没有听到多少不同的意见。

周化民：好多意见被压下了！周原是新华社记者，他说，他已经留有余地了。他不同意不同的意见，我说那就算了吧，我也就不说了。

任彦芳：当时周原反驳说，焦裕禄的精神已经变成物质了，就是已经改变了面貌了嘛。事实是兰考并没有改变什么面貌；有所改变，与根本改变面貌还距离非常远。当时沙荒、盐碱，尤其是盐碱地非常严重。后来大通讯一发表，很多人来参观，才看到原来兰考还是这么贫穷，灾害还是这么重啊。

刘俊生：但是主要是穆青一直说，焦裕禄的精神非常的好，如果焦裕禄精神能够宣扬出去，兰考的面貌也总要有点突出的表现；没有这个兰考新貌，焦裕禄精神也不好表现。

曾子墨（主持人）：1966年2月，江青受林彪委托在上海组织有关人员就部队文艺工作的若干问题举行了座谈。江青在会上讲，文艺黑线专了我们的政。她还认为之前有一大批文艺作品，是在暴露社会主义黑暗面。在这次座谈会上，部队的很多文艺作品都被打成了文艺黑线。在这种压力下，北影和长影要拍摄的电影《焦裕禄》，因为不能够解决描写兰考县自然环境的恶劣所带来的负面影响而被迫搁置了；而此时大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发表后也同样面临尴尬境地。